



關心社會・坐言起行

余理謙著

勞寶霞譯

基督勞工堂在一九六七年建成。這個堂區的名字很有意思，它反映著當時剛剛結束的梵二大公會議精神：教會不再是凱旋的教會，而是與社會上遭忽視的群眾站在一起。基督勞工堂的首位主任司鐸涂挽靈神父表示，當時有九成的堂區教友都是普通的工人，他們在工廠老闆的關照下工作和生活。當時的勞工法例絕無僅有。也許不少人仍記得，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亦是由一場勞資爭執所觸發的。所以，這所教堂的名字，尤其是中文譯名，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大膽的。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初夏奉派往基督勞工堂服務，不覺已十一年，在其中七年的時間更要擔任堂區主

任的工作。這是我首次在堂區內服務。在這之前，我主要是在大學和大專擔任學生神師的工作。當時正是學運高漲的年代，處在這個環境之中，使我更願意為爭取社會正義和人權而努力。此外，我也曾在兩個不同的時期當工人司鐸，這是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希望能夠長期為工人服務。可是，當我經過了一段長時期的祈禱和自省自察後，便發現這份工作並非是我真正的使命。

早期的日子

在我接任堂區職務不久，便要作出一個困難的決定。一九七八年，世界盃賽事在阿根廷舉行。阿

根廷當時的人權紀錄很差，阿國人民在一個高壓政
府的管治下，人權常公然遭受踐踏。國際特赦組織
爲此發起了一個『要足球，不要折磨』的運動。我
亦是該組織的會員。在總決賽舉行的主日，我應否
提及這事呢？絕大多數的教友都被視爲不關心社會
正義和人權的人。我爲此問題思索良久，終於決定
冒險一試。當日，我小心選擇一些有關教會人士被
剝削人權的事件作爲例證。我僥倖地成功了！據我
所知，他們並沒因此而表示不滿。

數月之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請我寫信給
薩爾瓦多政府，就該國當時一間靜修所被襲擊的事
件表示關注。在事件中，數位避靜人士遭殺害。當
我問其中一位堂區朋友，是否有興趣聯署該信時，
他除了表示樂意支持之外，還提議我將此事與所有
堂區教友分享。我在當時仔細考慮後，覺得時機尚
未成熟，便把這建議擱置一旁。數日後，我與一位
堂區神父在閒談間再提及此事，他竟然當下表示贊
成，還認爲這事件會引起堂區教友的關注。於是，

我便在跟著的主日彌撒中向教友詳述這宗血案的來
龍去脈，並邀請他們在一封關注信上簽名支持。結
果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竟然有百多位教友在信上
留名。這個在主日分享時事的嘗試，亦爲我們日後
在籌辦活動時，提供了一個好方法。

一直以來，我都希望能在堂區成立一個正義和
平小組，並不斷物色有興趣的人士加入籌組的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堂區正義和平小組正式宣佈
成立。這個組織在成立初期只有成員四人，但隨後
逐步增至十位成員。這小組亦曾面對不少困難，在
它成立的第一年，我們便要宣佈進入『冷靜期』，
來讓會員反省反省。幸而它並沒因此而解散，並且
能在這痛苦的過程中漸趨成熟。最後，它還發展成
爲一個緊密聯繫的小組，如同一個『基基團』一樣。

在早年的日子，有兩件事是甚爲特別的。首先
是一九八零年三月薩爾瓦多羅米諾總主教在彌撒講
道時被射殺身亡。我們的正義和平小組將一幅羅米
諾總主教向群眾宣講時的照片放大至適當的面積，

在隨後的主日彌撒中把這張照片放在禮堂的當眼處，向教友介紹羅米諾總主教的生平和他獻身於社會正義的事蹟，並略述他曾為貧苦大眾和受壓迫者所發表的立場鮮明的言論。我們並準備了一封關注信，邀請教友簽名支持。他們的反應奇佳，有超過四百人簽名。這封信後來寄往薩爾瓦多有關當局。

第二件事與波蘭實施戒嚴令及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被逮捕的事件有關。我們再次準備一封關注的信件讓教友簽名，這次更有超過七百位教友聯署支持。波蘭的格林普樞機親自回信答謝我們。他這封信一直成為基督勞工堂最珍貴的收藏之一。

小組工作的發展

在最初的階段，正義和平小組把大部份的注意力集中在海外的時事問題。但漸漸地，小組便開始聯合本地的其他組織，投入關注香港的社會事務，其中一項是代議政制和立法局直接選舉的問題。我們的小組積極參與支持的活動，包括參加遊行示威、

發表聲明和在堂區內發起意見調查的工作。政府在那時曾就政制問題印發綠皮書，徵詢各界人士的意見。我們的堂區呼籲教友踴躍發表意見。我還記得有一個主日，當我請教友抽空閱覽那份綠皮書和發表意見時，我向他們打趣說，日後悔罪禮儀之後的補贖便以閱讀那份綠皮書為原則：犯小罪者閱一章；犯大罪者便要閱全本了！此語雖出，但我並沒發現來辦告罪禮的人數較前減少。

此外，我們的正義和平小組亦開始關注身邊的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與我們附近一所專門放映三級電影的戲院有關的。普遍的意見都認為，這間戲院的電影廣告的大膽程度遠遠超過政府所定的許可極限。我們小組的一位成員跟他的太太商量後，決定定期拍下在這間戲院張貼的海報，然後寄給議員和有關的政府部門。此舉為該院商帶來不少壓力。雖然他們從來未因此而在法庭被判有罪，但至少警方亦曾沒收了這間戲院的廣告製品，令院商不知所措。我們的堂區曾決定動員所有教友；甚至聯合區

內的有心人士，一同爲此問題抗爭到底。可是，在我們還未有任何具體行動之前，這所戲院的老闆已決定結束營業。我們成功了！但這成績當然不只是我們正義和平小組的努力所致的。

在八十年代初，另外一個以社會關注爲主的組織在堂區成立，這就是國際特赦小組。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物色有興趣的人士參加這個組織，但小組初創時卻因一位主力成員的退出而大受打擊。不過我們卻並未有因此而垮下來，反而更努力地掙扎求存。不久，國際特赦小組還協助堂區籌辦了不少活動，包括：在十月紀念良心犯、在十二月爲人權慶祝和在拜苦路中爲被剝削人權的人祈禱。我們亦曾爲一位在菲律賓與我們常互通消息的良心犯祈禱。後來，我們小組一位創意豐富的組員印製了一個國際特赦小組的徽號：一枝燃點著的臘燭被一度鐵絲網圍繞著。我們以此徽號作爲禮儀的裝飾。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象徵，它本身所表達的內容已是一篇最有說服力的證道詞。

一個由國際特赦小組贊助的活動終於誕生了。當時，一位在吉隆坡工作的喇沙會士 Anthony Rogers 與新加坡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 Vincent Cheng 被當局拘禁。時值聖誕，一位同是國際特赦小組的主日學導師，爲主日學的小朋友舉辦了一個聖誕咭設計比賽。在十二月初一個以人權爲主題的彌撒中，大會頒獎予得獎的小朋友，並同時邀請堂區教友在得獎的聖誕咭上簽名和寫上關懷之詞，致送給獄中的 Anthony 和 Vincent。這是一個維護人權的新方式，不單讓小孩也可參與，而且由兩個堂區組織合辦，便更具意義了！

在八十年代後期，一個全新的堂區議會成立了。據新會章規定，該會其中一個執行委員會必須負責聯絡及發展堂區的關社活動。但更重要的突破是，這個全新的堂區議會並非只是諮詢性的，而是有實際的執行權力。堂區主任司鐸在議會中有投票權；但沒有否決權。此舉因爲跟現時的教會法有抵觸，所以在通過之前，必先獲教區批准才可實行。這樣

的運作方式後來被決定試行一年，結果成績令人滿意，這個新制度便成爲永久的運作方式了。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但成效顯著，有目共睹。

其後，堂區教友在同年還得到行使真正民主權利的機會。那時，有人建議更改主日彌撒的時間。我們於是正式向教友提出這建議，呼籲他們回家考慮和討論這個問題，並爲這個問題祈禱。我們向教友強調，他們所投的票將是決定性的。結果大部份人都投票贊成更改彌撒時間。回想起來，我欣賞整個投票過程，多於投票出來的結果。

工作的形式和方法

在起初數年爭取社會正義和人權的工作上，我們可說是湊合成法。可是，隨著年月和經驗的累積，某些特定的方法和形式便漸漸形成了。

在一月，我們有一個正義和平主日；在四旬期的其中一次苦路禮儀中，我們會爲爭取人權或爲人權而身陷囹圄者祈禱；在耶穌受難日，我們會在信

友禱文中加入一段爲正義祈禱的短文；在五月第一個主日的勞工主日所作的活動將在下文詳述；在十月，我們會爲良心犯祈禱；在十一月，我們不但爲所有亡者祈禱，還特別爲所有在前數年爲正義和人權犧牲的亡魂祈禱；在十二月，我們強調人權的重要性；並在聖誕節爲菲律賓的窮苦學生籌款。此外，我們也會發起具體的行動來表達我們的意願，通常是致函有關當局或機構，並呼籲教友聯署支持。

勞動節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在最接近五月一日的主日，基督勞工堂爲了表達它對主保之名的崇敬之情，以及顯示它對香港勞工界的關注，便決定大事慶祝。正如前述，這便是其中一個以彌撒來慶祝的特別日子。所有在香港的工人司鐸都會在那天主持彌撒或講道。在某些時候，也會有一位青年工人出來證道。當日十分之一的彌撒奉獻金會用來捐助一些勞工組織，作爲籌辦活動之用。我們的捐助對象通常是公教職工青年會。此外，我們亦會準備一封要求改善勞工福利的聲明，向教友宣讀一遍之後，

便讓他們隨意簽名支持。

此外，我們亦曾就特別的事件作出回應。有一回，主日讀經選取了《雅各伯書》有關平等的經文。當時，種族隔離問題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我們寫了一封慰問信給南非大主教杜圖。數月後，各界開始對南非政府實施經濟制裁，我們亦率先響應，在一個主日的證道中，正義和平小組的一位教友會員向我們講述了南非當時的政經情況。主祭神父最後以福音經文的反省作總結，可謂配合得天衣無縫！但後來我們得悉，原來堂區的存款放在一間與南非政府有密切關係的銀行裡，我們應否把存款提出來呢？可惜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認真地解決。或許這是我們的錯，我們忽略了行動的整個意義。

我們亦會經常協助個別的教友伸張正義。曾經有一位老婦人因工業意外而導至永久但不太嚴重的損傷。我們曾為此事在醫院、政府的有關部門、律師樓和法庭之間東奔西走。這是一個漫長而令人氣惱的過程。但我卻能在初時體會到香港現實的一面

以後，漸漸懂得珍惜在這過程中所學習得到的經驗。最後，我們雖然能為這位老婦爭取到賠償，但想不到大部份的賠償金竟然需要用來繳付律師費。

在我開始在基督勞工堂服務的時候，該堂區已有三個社會服務小組。其中一個解散了。另一個小組在經歷一段活躍時期後亦冷淡下來。可是，第三個小組卻越幹越起勁，小組大部份團員都不是教友。他們曾在牛頭角區進行一個廣泛的社會調查，並把結果刊印在了一本小冊子內，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此後，便有不少人士和機構打電話來索取這本小冊子。我們並沒預期市民對這本小冊子的需求是這樣大的，所以便造成求過於供的情況。幸而我們還可以保存一本留念！

反省

在這十一年令人愉快和興奮的日子之內，我們籌辦了不少活動。但結果如何呢？曾接受我們捐助的菲律賓學生後來寫了一封致謝信給我們，表示如

果沒有我們的金錢支持，他們便不能繼續學業。格林普樞機亦曾代表波蘭人民寫信多謝我們。此外，我們亦小心保存那位菲律賓良心犯的答謝信，我們得悉寄給他的信會為他帶來鼓勵和支持，可能還對他後來獲釋有幫助。不過，我們並非要指出，我們可以令這個不公平的世界結構有任何重大轉變。但為這些關心社會的組員來說，他們卻改變了不少。他們那份爭取正義的使命感變得更為成熟和充實。所有組員對時事都十分熟悉，其中有些人還具備高度的社會分析能力。

可是，一般的教友又是否因此而改變呢？我可以說他們的社會意識比較以前牢固了不少，這是不能矯飾出來的。以下是一個好例子：我們在星期五早上的彌撒通常會為良心犯祈禱，可是後來取消了。有一天，一位上年紀的女教友前來問我，為何在彌撒中缺少了這個特別的祈禱。她的覺醒是一個證明，不過，這只能證明她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意識，卻不能表示她對良心犯的定義有正確的認識。

此外，我們就不同問題所發表的聲明，尤其是正義和平小組所發表的聲明，都常會在《公教報》上刊登。當我在某些場合中介紹自己時，人們的反應通常是：『基督勞工堂，不就是那個十分活躍的正義和平小組所在的堂區嗎！』可是，這些讚美之詞必須名副其實。一九七一年的教區會議已作出決定，促請各堂區設立一個社會關注小組。但這些年來，在香港教區的六十個堂區裡，只有十二個堂區設有這樣的組織。有些堂區的小組甚至只有一個人！所以，我們只能謙遜地看待目前的成就。

我們在信仰和跟進的工作上仍有不足之處。在每次開會前，我們都會有一段聖經分享的時刻。所選的聖經章節亦與正義的問題有關。在大家閱罷經文之後，便會有一段靜默的時間，然後便會祈禱。這個過程對我們十分有用，卻並不足夠。此外，我們亦必須著重培訓要理教授員。當然，在培育中也必須加入社會意識的基本訓練。另一方面，跟進的工作又如何呢？我們曾經致函往不同的機構和政府

部門，這些機構雖然都會回覆我們，但有關的問題卻不了了之。我們往往讓這些未解之結輕易地石沉大海。或許我們關注太多的問題，而忽略了個別事情的跟進工作。

禮儀主義者可能會不滿我們處理禮儀的方法。例如：我們會為某些並非是經常發生的事件舉行彌撒。可是，我們必須強調，類似這樣的彌撒並不會經常舉行。而且，我們一直是按照禮儀年曆的次序來安排工作的。此外，我們亦曾請教一位享負盛名的亞洲神學家，與他討論有關禮儀安排的問題，才作出這樣的安排。教會經常強調，禮儀必須能表達我們捍衛正義和人權的承諾。但實際上又能否做到呢？在某些國家，禮儀學家和社會運動主義者似乎是並肩前進的，但他們尚未有真正的會談。可幸香港已在這方面踏出了試驗性的第一步。

神父始終是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他積極支持，關社小組便不能迅速地發展起來。再者，如果他能夠對堂區教友表示信任，很多錯誤也較容易為人

接受了。可是，這是否是一個理想的情況呢？或許這是一個尚未成熟和有待發展的教會吧！

結論

要建設一個具備社會意識的教會，我們當然需要遠見、勇氣和改革的精神。但我們更需要的是：耐性——社會意識的培育並非是『即溶咖啡』，一沖便可飲。

敏銳的反應——我們必須勇於接受挑戰，但並非是與人為敵。

一顆寬宏大量的心——可使我們容易接受很多不能避免的錯誤，讓工作繼續發展下去。

著名的G.K. Chesterton曾說：『那個自稱沒有犯錯的人便是從沒做過任何事的人。』

胡樞機在《邁向光輝十年》的牧函中，談及教會的『僕人和先知角色』，就讓我們勇敢地負起建設這個僕人和先知教會的使命吧！